

岭南神话解读

农学冠 著

广西与
东南亚
民族文库

主 编：张有隽

副主编：徐杰舜 顾有识

广西民族出版社

岭南神话解读

农学冠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广西与东南亚民族文库
LINGNAN SHENHUA JIEDU

岭南神话解读

农学冠 著

责任编辑 陆文杰
封面设计 李筱茜
责任校对 黄世杰
责任印制 蓝剑风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南宁市广香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3-3738-8/C·103

定价:16.00 元

编辑出版说明

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广西各民族与东南亚各国、各地区的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或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等方面有着十分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广西与东南亚各国、各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我们早就认为，把广西各民族置于东南亚这一地缘从整体上加以审视，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广西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而且对促进广西对外改革开放，推动本地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不无好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广西与东南亚民族文库》这套丛书。

《广西与东南亚民族文库》是学术研究丛书，规模在 30 种左右。选题范围，时间上溯古代，下至当代，内容包括“族别历史系列”、“政治与社会组织系列”、“习俗与信仰系列”、“民族政策系列”及“综合系列”等。从 1997 年开始陆续出版，到 2006 年全部出齐。

本丛书的编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广西与东南亚民族历史与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既反映本地区各民族在人种、起源、语言、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的特点和风貌，又反映本地区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广西各民族与本地区及外地区各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关系；既反映各族民间交往，也反映官方往来。以收录广西人的著作为

主，也适当收入区外及国外（含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国家）学者的著作。力求多层次、多视角地揭示广西与东南亚各民族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以及长期以来多方面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关系，展示出本地区各民族未来发展的趋向。

在编辑体例上，既保持整套丛书的完整性，又注意照顾各个系列的相对独立性。对选题在学术上不作统一要求，只要持之有据，能自成一说。但视角要新，学术上要有开拓性，内容要翔实，文字要简洁、流畅，并注意通俗性，以照顾学术圈以外其他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广西有关部门领导积极关注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民族学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广西重点学科之一，为本文库的问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广西民族学院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文库的编纂工作，拨出经费支持丛书出版，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及广西民族出版社为编辑出版本丛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广西与东南亚民族文库》

编 辑 委 员 会

1997年2月

总 序 / 张有隽

东南亚包括印度支那半岛、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部）和菲律宾群岛。由大陆部分和海岛部分组成。总面积约 447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 亿。

传统上所說的东南亚国家，自西而东，有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这里每个国家都居住着许多民族，但各国究竟有多少民族，迄今尚无精确统计。根据语言和文化特征，东南亚各国民族分布情况是，缅甸约 30 多个民族：操藏缅语的缅人、克伦人、克耶人、克钦人、那加人，操壮侗语的掸人，操南亚语的孟人、德昂人、佤人，操汉语的华人；泰国有 20 多个民族：操壮侗语的暹罗人（空泰人）、寮人、掸人、卢人、昆人、富泰人等；操南亚语的孟人、拉瓦人、库伊人、仲人、卡隆人、塞若人、塞老人，操南岛语系语言的马来人、占人等，操汉藏语系语言的华人，藏缅语的阿佤人、缅人、克伦人、傈僳人，苗瑶语的苗人、

瑶人，此外还有来自南亚、欧洲、美洲的人；老挝据称有 68 个民族群体：操壮侗语的老龙人（寮人）、老听人、老松人、卢人，操南亚语系语言的高棉人、拉棉人、泰丰人等，操汉藏语系语言的华人、苗人、瑶人，还有越南人；柬埔寨主要为操南亚语的高棉人，此外，还有越南人、马来人、占人、寮人、印度人、华人和其他一些小民族群体；越南有 50 多个民族群体：主要为操越语的京人、芒人，操汉藏语系语言的华人、苗人、瑶人、岱人、侬人、泰人、沙人，此外，有操南亚语的高棉人，操南岛语系的占人、嘉莱人、摩伊人、埃地人、巴纳人；新加坡主要为华人，其次为马来人，还有来自南亚地区的移民；马来西亚有 10 多个民族群体，主要是操马来亚语的各民族群体，如马来人、达雅克人、塞芒人、塞诺人等，其次是华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有约 20 多个民族群体，主要为操南岛语系语言的爪哇人、马都拉人、巴厘人、巽他人、米南加保人、巴达克人、齐亚人、达亚克人、托拉查人、望加锡人、布吉人、米纳哈萨人等，此外，还有华人，及操巴布亚语、美拉尼西亚语的民族群体；文莱主要是操南岛语的马来人、达雅克人、泰通人，此外，还有华人、黑色葡萄牙人、印度人、英国人等；菲律宾据称有 90 多个民族群体，主要为操南岛语的比尔科人、他加禄人、比萨扬人、伊洛克人、伊富高人、卡林加人、邦都人、阿埃人、摩洛人等，此外，还有华人，少数阿拉伯人、马来人等。

目前世界上的民族群体有 2 000 多个，分布在东南亚各国的约占 1/10。这还未包括我国华南、西南的各民族群体。有人认为，我国华南、西南应属于东南亚范围。这从地理上看有一定道理。华南及西南是我国民族单位最多的地区。我国 56 个民族，华南及西南就有 34 个，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也居多数。如果加上华南和西南的民族，东南亚民族成分还要增多。

二

广西地处华南，毗邻东南亚。这里不仅有北部湾海上便利通道，还有连接华南与东南亚的大陆桥。历史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通过广西建立起的交往关系不绝如缕。广西各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在人种起源、民族渊源、历史、语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首先，就人种而言，我国华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均属南方蒙古人种。南方蒙古人种是蒙古人种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相混合的产物。这个种族在一般的蒙古种外貌（浓密的直发、扁脸、扁鼻、蒙古眼）之外，还有某些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较深色的皮肤，有时带橄榄色；阔鼻；突颧；厚唇等）。这些特征在马来亚种族类型集团本支中表现得最明显。一般认为，这个类型集团从远古到现在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南方人、朝鲜人、日本人，以及中印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几乎所有民族中间。蒙古人种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成分相混合的过程起源于中石器时代，延续至铁器时代。例如，在越南北部湄江地方发现的中石器时代头骨就有蒙古种特点^①。泰国北碧府、叻丕府、北揽坡府及华富里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属蒙古人种。^②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从南亚、东南亚发现的大量古猿化石资料推断，这一地区有可能是人类发祥地。尽管这一论点还有待进一步

① 托尔斯托夫主编，周为铮等译：《普通民族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60年4月，第21页。

② [泰]亲·育迪著，方士伦译：《泰国史前时代》，《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增刊。

研究证明,但至少在数十万年前,生活在华北的“北京猿人”是蒙古人种的直系祖先。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整个中国大陆存在着一种并不特化的、但有各种体质差异的蒙古人种群体。由于南亚向澳大利亚移民,在澳大利亚形成了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蒙古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互相扩散,在交叉地区便形成了南方蒙古人种。由此可见,广西乃至整个华南和西南,与东南亚各民族在人种上存在着共源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在语言上,虽然语言与种族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与人类起源同步并对推动人类脱离动物界起过重大作用,在种族形成过程中继续发展,并随种族迁徙扩散到各地。语言学家根据共同来源这一特征对语言进行谱系分类。这种分类法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些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人类在地面上的最初分布和各民族的形成,有重大意义。在人类迁徙、分布和人种类型形成过程中,逐渐演生出各种居民语言。根据语言系谱分类法,现在居住在东南亚各国各民族的语言,可以归纳为汉藏语系、南言语系、南岛语系三大语系。其中操汉藏语系语言的人数最多,又可分为汉语(主要是华人)、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这与广西各民族语言系属相同。总之从语言的角度看,广西各民族与东南亚许多民族也有亲缘关系。

第三,在民族起源上,用不着争论,遍布东南亚各地的数千万华人(汉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广西迁出去的;居住在越南、老挝、泰国的50多万瑶族大多数是从广西迁出去的;居住在上述三国的100多万苗族一部分是从广西迁出去的;就是操同一语族即壮侗语族,人口达9000万,分别居住在越南的侬族、岱族、高栏、热依、布衣、泰族,老挝的老松人、老听人、老龙人、卢人,缅甸掸人,泰国的空泰人、寮人、昆人、富泰人、掸人、卢人等,与我国壮侗语族诸民族在起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越南岱、侬、高栏、热依等族与广西壮族同源,在学术界

无多大争论；其中侬族是宋代以来分别从广西龙州、大新、天等、崇左、那坡、靖西等县迁出去的，迄今在越南还有昭侬（故乡在龙州）、万承侬（故乡在万承州）、爽侬或崇善侬（故乡在崇善）、英侬（故乡在龙英）、雷侬（故乡在下雷）、归侬（故乡在归顺即靖西）等称谓。关于泰国的泰人各民族群体，过去泰国及西方学术界有“南来说”、“北来说”两种。“南来说”即认为泰人起源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北来说”者，有的说泰族起源于阿尔泰山，有的说起源于四川、云南，有的说起源于山东、湖北，有的说起源于华南。近年通过中泰两国学者多次合作考察研究，多数人认为泰人起源于华南，与壮族，尤其是广西操南部壮语方言的壮族各支系有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① 现代泰语中许多基本词汇与壮语南部方言一致。操壮语南部方言的壮族到泰国与泰人交谈，一句话拆开来说，许多单词都听得懂，互相之间有亲切感。除了语言能证明泰人与广西壮族乃至壮侬语诸族有同源关系外，还有文化上的一些共同特征，如稻作农业，喜欢住干栏房，共同拥有的类似的人类起源、万物起源的神话传说。上述泰人与壮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性，在老挝老人、缅甸掸人与壮族之间同样存在。以广西为居住中心的我国华南壮侬语族诸民族，与遍布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壮侬族语族诸民族，西延至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人亦属壮侬语族民族，他们在起源上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

第四，从历史发展看，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很早就建立了交往关系。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地理书，也是一部反映古国、古民族社会民情的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其涉及的范围比现在中国的疆域面积要大得多，包括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亚、缅甸。此书按

① 范宏贵：《泰族起源与迁徙再探》，《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

照不同地区，记载古国或古部落的地理位置、人体形状、特征、民族来源，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情况、生活资料的来源和生活方式。《山海经》记载的主要是黄色人种，个别地方也提到黑色人种。反映了我国人民还在秦汉以前，对周边的东南亚地区各民族已有了接触和了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军岭南，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象郡包括今越南北方部分领土。中国政治势力第一次深入今东南亚地区。汉代在岭南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苍梧、郁林、合浦三郡在广西，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深入东南亚地区。

古代海上交通不发达，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主要靠陆路。秦汉时期，中央封建王朝势力虽然也深入到了云南地区，但西南边远，交通不利，因此，广西成了我国与东南亚地区来往的便利通道。我国通过广西进入东南亚各地的人员越来越多。除了官员和军队以外，还有不少商人及流民到了现在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地。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古代部落首领及其属下人员，也以朝贡方物、经商等方式，途经广西到达中原。这种相互交往的现象随着中国封建势力的越来越强盛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盛唐时期，中国威力远播四方，《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七条，五条是陆路，其五便是“自交州通天竺道”；两条是海路，其二是“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唐朝向海外出口大宗瓷器、铁器。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人的铸铁厂。宋代与东南亚的交往又进一步发展。北宋时，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南洋群岛，都与宋朝有贸易往来。到元明时期，中国仍是亚洲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元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282~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出兵安南、缅甸，一次出兵占城、

爪哇，不少中国人到达南洋。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我国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柬埔寨、暹罗，以及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与政治接触比以前更加频繁。当时，除远距离靠海上交通外，与毗邻国家来往仍主要靠陆路。明末，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江浙闽广地区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失掉土地的农民往海外谋生成了一条重要出路。当时的移民除了从福建、广东直接出海外，还有不少人移居广西，再从广西移居越南、柬埔寨、马来亚、泰国等地，其中包括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据史料记载，明朝初年，移居东南亚各地的中国人，在爪哇的杜板、稣鲁马益、新村等地有数千家，此外在美洛居、渤泥、文莱、吕宋也有大批中国人^①。到明朝中叶，在南洋的中国人更为增多，仅吕宋已多至数万人。他们“往往久住不反，至长子孙”^②。

广西有陆路通道，因此广西人移居东南亚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至少可追溯到汉朝。西汉时，马援征交趾，留下部分驻守官兵，其后汉朝中央政府又陆续派官员前往越南任职，这些人中有的后来长住越南不返，成为当地居民一部分。此外，汉代合浦港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丝绸之路”，当时已有一些广西人经海上迁至暹罗等地。唐宋以后，广西已成规模性地向东南亚移民。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广西人移居东南亚尤其是印支各国的日益增多。历史上广西人出国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因做官、征战出国，有的因经商出国，有的因避灾乱出国，有的因人口增长、生计困难出外谋生，也有的因反抗斗争失败出国，还有有的为继承产业出国，或因劳务输出而出国等。出国的通道主要有五条：一是海上通道，经合浦（北海港）、钦州龙门港直接出海；

①（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三，转引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3页。

②《明史》卷三二三《吕宋传》。

二是西江水路通道，从南宁港、梧州港经广州、香港出海；三是陆地南部边境通道，经防城、东兴、过北仑河入越南及印支半岛其他国家；四是陆地中部边境山区通道，从爱店、镇南关（今友谊关）、水口、平而关、龙邦、平孟等边关隘口，进入越南北部；五是陆地西部边境通道，经百色到云南文山，从河口、勐腊等边境出关进入越南、老挝、泰国。广西长期向外移民的结果，使广西成为当今中国的重点侨乡之一。据 1990 年统计，在国外的广西籍华侨、华人有 260 多万人，自治区境内归侨、侨眷 118 万人，合计 380 多万人^①。这还未包括大量长期居住国外已同化成当地民族，或虽未同化但已加入所在国国籍而未登记为华侨或华人的，更未包括移居境外的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如壮族仅移居越南，被越南确认为依族、岱族的就有 189 万人（1989 年数字）。

第五，从经济联系上看，根据史籍记载，从汉代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各民族从商业的往来开始，逐渐发展到技术、资金、原材料、人员和劳务等多方面的合作互补关系。我国古代向东南亚输出陶瓷、茶叶、丝织品、农具和有关生产技术，从东南亚进口珠宝、犀象、优质木材及某些作物种籽和种植技术，近代向东南亚输出人员和劳务，资金和矿冶技术，商业管理经验，从东南亚华人中获得国家建设的各种资金，技术和经验，这都是有史可鉴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地借助了东南亚的资金、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同时，中国的发展也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两地关系愈加密切。关于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在下面还将论及。

第六，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看，不仅旅居东南亚各国的

^① 向大有主编：《广西通志·侨务志》，《概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6 月。

华侨、华人带去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对当地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病祭、节庆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华侨和华人也受到当地饮食、居住、服饰等习俗影响，二者风俗习惯相互渗透，而且有些民族群体，如壮侗语族诸民族、苗瑶语族诸族、孟高棉语族诸族，藏缅语族诸族，由于同源关系，他们的衣着、饮食、居住、婚丧、节庆、礼仪等风俗习惯，以及神话传说，歌舞艺术和民间宗教信仰都是基本上相同或相似的。

三

国外有的学者在谈到亚洲文明时，认为亚洲不像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使欧洲发展起来的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那样，有传统的连续性和一体性，“在亚洲，至少有中国系，印度系，伊斯兰系三大文明源流，其周边和中心的各种文化，多少都是在这三大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反复兴衰的。”“正如印度支那一词所表示的那样，东南亚大陆位于印度和中国两大巨人之间。两国文化交错影响，使东南亚创建成为独特的混合文化的地区”^①。笔者认为，若论东南亚地区，除本土文化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都发挥过作用，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影响最大的要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和东方大国，从历史的早期起，一直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中国从远古以来持续不断地向东南亚地区移民，不但使东南亚地区在人种构成了渗入了大量

^① [日] 绫部恒雄著，曾少立译：《泰族的历史及文化背景》，《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增刊。

蒙古人种因素，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有许多华人移民，而且伴随移民带来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因素，对推动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作用。根据在越南北部、泰国北部等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国有可能在中石器时代已向东南亚传播了制陶术，春秋战国时期向这里传播了铜鼓和青铜冶炼术。秦、汉时期，当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尚“不知牛耕”，“烧草种田”，“射猎为业”，“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时，中国已带去了牛耕、田器铸作及穿渠灌溉技术，并编制“越律”，教以婚聘礼法。^①唐、宋以后，中国商人把瓷器、丝绸、铁器、金属货币带到印支半岛和南洋，同时收购当地的胡椒、谷米、象牙、珠宝，发展了中国和东南亚的商业关系。留居印支半岛和南洋的中国人，从中国带去了铁锄、铁犁、制糖和采矿的工具和技术，带去了茶种和培植茶叶、胡椒、蔬菜的技术，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了大量农田和矿场。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也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唐以来，东南亚各国商人携带大批土特产品到中国经商，不但丰富了中国市场物品，促进了两地交通和贸易，带动了中国南方造船业、海外运输业、商业的发展，而且给中国带来了东南亚手工艺品制作技术、农作物种子和培植技术，如甘薯（红薯）就是从菲律宾、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从占城（今属越南）的传入中国也是著名例子。

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的忠、孝、仁、义之道，道教、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的济人、救世思想对人们的观念行为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历代前往东南亚的中国人，在当地积极传播中国文化，使儒家思想以及道教、佛教在越南等国家传播。留住东南亚的中国人，不但掌握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

^①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任延传》，卷二十四《马援传》。

理经验，善于经营，而且奉公守法、勤俭持家，团结互助，因此，一般在当地都获得较快的发展。他们多居住在城市或附近农村，经营手工业、造船业、商业、矿冶业、农场种植业，对促进当地城市的发展，沟通城乡经济发挥了极大作用。近代以来，在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相继出现了一批掌握当地经济命脉的富商巨贾，金融巨子，有些华人后裔进入所在国的政界、军界，对当地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不乏广西籍华侨、华人。

在近代史上，东南亚多数国家和中国一样，有一段共同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的历史。早在15世纪，西方就已开始对东南亚殖民。最先入侵东南亚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17~18世纪，英国、法国势力接着侵入东南亚地区。19~20世纪，美国、日本开始参与对东南亚的再瓜分浪潮。经过几个世纪的瓜分再瓜分，除泰国外，东南亚国家分别成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西方国家不仅控制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疯狂掠夺本地区各种富饶资源，而且对东南亚各民族人民散布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还从中国，尤其是华南掳掠了大量劳工，强迫他们为殖民者掠夺东南亚资源卖命。西方的统治和剥削严重地阻碍了东南亚各国社会的发展，其客观效果则是刺激了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长。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不甘心忍受西方的侵略和奴役，掀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对西方列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延至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才先后摆脱西方的统治，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相互支持，不仅旅居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当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而且中国南方作为革命策源地，和中国作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对援助东南亚

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广西各族人民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共同斗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从19世纪的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时期革命，直到建国后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广西各族人民百余年来各次斗争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斗争本质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为此而付出了重大牺牲。

四

东南亚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先后获得独立后，走上了重建国家的道路。进入七八十年代，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新加坡、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发展到今天，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圈，与欧、美经济滑坡，其他地区民族纷争不已，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东亚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族和睦，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亚洲经济的繁荣，亚洲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正在增强。亚洲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技术和经验，但不崇拜西方式的民主。他们反对个人绝对自由，提倡集体主义和遵守纪律，依靠有效的行政管理调节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一些西方人议论的所谓“亚洲模式”和“亚洲价值观”。人们在谈论“亚洲模式”时还进一步发现，在东亚和东南亚，首先获得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即被称为“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都是华人或